

·学术论坛·

先秦到汉代的阅读疗法思想和医案

王波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梳理了先秦到两汉的阅读疗法思想和医案,勾勒出阅读疗法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概况。

〔关键词〕 阅读疗法 读书疗法 图书疗法 先秦 秦朝 汉朝

图书馆与医疗素有渊源,古代埃及的一些寺院图书馆就因是治疗中心而闻名,馆内收藏的基本上都是医学文献,包括现在最大的纸莎草纸卷,掌管这些文献的图书馆员被称为“生命之宫的文臣”^[1]。在古代埃及底比斯城的一个图书馆的正门上方还镌刻着“医治灵魂的良药”的字样^[2],意思是说图书是一种心药,读者阅读图书就是服用心药,可以医治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疾病。20世纪初,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界弘扬了古代埃及图书馆的理念,开始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入系统地探索阅读的保健和辅助治疗作用,古老而又新鲜的治疗方法——阅读疗法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迄今,西方的阅读疗法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论著屡见不鲜,以阅读疗法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时常召开,还有不少研究生以研究阅读疗法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不但图书馆学界研究阅读疗法,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也关注阅读疗法,阅读疗法可以说是一个吸引多学科共同探索的研究领域。那么准确地说,什么是阅读疗法呢?阅读疗法指的是把阅读作为养生保健和预防以及辅助治疗疾病的手段,使自己或帮助他人保持或恢复身心健康的一种方法。

在阅读疗法研究中,阅读疗法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个必要方面。西方研究阅读疗法史,就很重视对历史上的阅读治疗思想和现象进行追溯、整理、分析和总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不乏关于阅读疗法的思想和实例,阅读疗法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然而中国对阅读疗法的专门研究起步甚晚,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关注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做一些引介工作。至于中国历史上的阅读疗法素材,尚未有人加以系统的整理。本文尝试对中国先秦到汉代的阅读疗法思想和医案进行整理和总结,勾勒出阅读疗法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简史。

1 中国阅读疗法的源头及先秦到汉代的代表性文献的治疗价值

文化人类学认为,从源头来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发生的动机,都是因为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有太多的无助感、敬畏感、茫然感、空虚感等精神危机,需要创设精神支柱和价值系统来加以疗救,从而才导致了这些学科的发生。既然人文科学本身是出于治疗的目的而发生的,先天具有治疗的功能,那么,阅读载有人文科学内容的读物,当然也就具有了治疗的功效。阅读疗法之所以是可信的,首先体现在它具有发生学的依据^[3]。

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是从人类精神发展史的宏观而论,那么中国的阅读疗法具体起源于何时?根据中国南朝梁代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的考证,早在远古,中国人就创造了文体“箴”,用以规过,疗以心疾。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铭箴”篇中说:“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4]。这里的“针石”,指的是古人治病时用的石针和矿物性药物,“三代”指的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夏、商、周。箴作为一种文体,是由古代以针和药石治疗疾病的事实引申来的:人有生理疾病,可以用针药治疗,人有心理的迷惘和过失,亦可用箴谏、箴诫来疗救。“箴”的本义就是“针”,为了和治疗生理疾病的“针”相区别,表示专门治疗心理疾病,才将此类文体以“箴”字命名之。刘勰对文体“箴”之源流的考证,向我们揭示了阅读疗法在远古中国的存在。箴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有意识开展阅读疗法的开始,无意识阅读治疗活动的渊源还可能更早。近现代我国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是处于胎儿时期的汉文图书,其中那些记录占卜手或龋齿能否痊愈的卜辞的甲骨,在医学文献史上被称为“疾手”、“疾齿”^[5]。谁能否认在巫医占主导形式的早期医学时期,在夏代第一篇箴文《虞人》出现以前,一个有身心

问题的古人,在占卜后得到一块表明吉兆卜辞的甲骨,不会欣喜若狂,身心疾病自愈、快愈呢?恐怕在甲骨文产生之时,阅读疗法就萌芽了。明代养生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把《易》中的“颐卦”归为保养之道,那么具有类似性质的记录吉兆卜辞的甲骨,当然也具有保健养生的功效了。

在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中,文学对心理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如果把中国文学的产生作为中国阅读疗法的源头,那么中国阅读疗法的历史将会上溯到更远。一般认为,文学起源于劳动。《淮南子·道应训》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6]也就是说,最初的文学作品本是原始社会扛大木头的人所发出的“杭育、杭育”的吆喝声,是适应集体劳动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作品的特点是把音乐、诗歌和人体的动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欣赏的过程是听、读、演三位一体。最早的宗教文献实际也有类似的性质,甲骨卜辞的制作和阅读都离不开宗教歌舞和巫术表演的环境。从治疗的角度看,这样的作品接受过程可以认为是音乐疗法、阅读疗法和行为疗法的三位一体,对缓解劳动的疲劳和克服精神上的茫然、无助、恐惧等危机都是比较有效的。

后来随着国家制度的建立,从属于劳动、宗教、巫术的歌舞演变为乐,乐包括乐德、乐舞和乐语,仍然是三位一体。由于乐的内容比较复杂,人们为了充分把握它,需要在集体演练之外,分别对乐德、乐舞和乐语进行反观、分析与阐释,由此导致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分头传习,这样乐语(也就是口头和文本形式的诗歌)就从乐中分离了出来。从治疗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阅读疗法从由三种疗法构成的综合疗法中独立出来。

先秦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产生了许多震古烁今的名人名著。先秦遗留下来的《周易》、《诗经》、《礼记》、《尚书》、《论语》、《老子》、《庄子》、《离骚》等名著犹如富含活性物质的人文初乳,生生不息地滋养着中华民族。这些名著微言大义,是中华文献中的核燃料,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有的文献当中还有专门论述养生的篇章,保健和辅助治疗的作用就更大,正如明代高濂所说:“保养之道,可以长年,载之简编,历历可指。即《易》有颐卦,《书》有‘无逸’,黄帝有《内经》,《论语》有‘乡党’。君子之心悟,躬行则养德养生兼得之矣。”^[7]从为阅读疗法选择“药材”的角度来检验这些先秦名著,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开发不尽的功效,是中华民族“心智药房”中传统的基本良药。

以形成于西周末年的《周易》为例。该书由64卦组成,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思维水平和认识能力,总结了当时人们分析、预测自然和社会运动的方法,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包含有祭礼、战争、生产、商旅、婚姻、水旱、灾害等十分丰富的内容,一直被认为是启迪思维、增长智慧的要籍。后人在患病时需要通过思考转移对病痛的注意力时,往往把《周易》作为首选的阅读对象。南宋的陆游在《六言杂兴诗》中云:“病里正须《周易》,醉中却要《离骚》。”^[8]明代养生家高濂把《周易》中的“颐卦”视为保养之道。还有人曾题曰:“读《易》有得方,诚用其方,则五脏皆受其益,询却病延年之上剂也。”^[9]《周易》被长寿的陆游指定为病中唯一的推荐读物,被学人誉为“却病上剂”,某种程度上说明《周易》在养生保健中确有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开展阅读疗法,《周易》是值得考虑的良剂,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再如孔子的言论集《论语》,记载下了孔子深邃的哲学思想、教育理念,记载下了他开导学生时语重心长的话语,也具有很高的心理治疗价值。中国人实际上世世代代都在通过阅读《论语》进行心理保健和辅助治疗,已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程度。现代成语很多都出自《论语》,使用汉语的心理治疗师不用《论语》中的词汇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文化中国或者说是华人世界推广阅读疗法,《论语》应该是必选的阅读物。阅读《论语》对华人而言,可以说是心理上的根浇、精神上的补乳。

至于《诗经》,则能够帮助读者“兴、观、群、怨”,即增长知识、提高修养、乐群开朗、排忧解难。《离骚》则能够帮助读者抒发忧思愁绪、疏泄不满与不平。

秦汉四海统一,文化繁荣,尤其是文学和史学发展很快。不仅有一些作家从理论上认识到文学的抒情排郁、攻防心病的作用,在身处逆境时积极地从事创作,一些帝王贵族,特别是汉代的帝王,从读者角度似乎也意识到了文学的这个作用,他们开始召集一批文学名著专门为自己写辞作赋,悦养身心。

汉代帝王对文学的娱乐和保健作用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忙于平定和巩固天下的汉初的几个皇帝,如高祖、文帝和景帝,都不是特别喜欢辞赋。率先召集文化,以玩味辞赋为乐的是诸侯王吴王和梁孝王,后来汉武帝喜爱辞赋,把擅长辞赋的枚乘、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吾丘寿王等赋家都召集到身边,赋的创作中心才由诸侯国转移到朝廷,开始为最高统治者服务。汉代帝王喜欢的赋是从战国诗文发展而

来,往往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对客观事物进行铺陈描写,今人多称为散体大赋或聘辞大赋。这种散体大赋因为受到汉武帝、汉宣帝的喜爱,一度畸形繁荣,不仅御前文学侍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夫亦“时时间作”。赋在宫廷的流行,产生了比较好的保健和辅助治疗的作用,个别成功的医案甚至见诸史册。

除了流行宫廷的散体大赋,汉代还有一种读者面很散的骚体赋,因模仿屈原的《离骚》而得名。和散体大赋绝对屈从于接受者的情况不同,骚体赋一般没有明确的接受者。西汉早期的骚体赋在内容上继承了《离骚》悲士不遇、穷极反本的特点,多是作者自抒忧愁幽思之作,后期的骚体赋又变异出述志、思玄、游仙等类型。对封建社会怀才不遇、仕途不畅的芸芸士人来说,骚体赋的排遣慰藉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留下的文献种类繁多,赋是宫廷阅疗治疗应用最多的一类,史传具有治疗价值的还有其他文体的名著,如《史记》等,有的著作牵涉到具体的医案,其药性和功效留待后面介绍。

2 先秦到汉代的阅读疗法思想

先秦到汉代的阅读疗法思想主要体现在诸子的某些言论里。

先秦诗歌多来源于生活,采自民间,出于众人之手,内容清新健康,娱乐和言志的功能很强。当时的主流社会主要是通过诗教来造就人才,孔子平生就非常重视诗教,尝言:“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0]他曾以“思无邪”的原则编纂《诗经》,在论及诗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其教化功能时,他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这段话的大意是:读诗可以使人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读诗可以使人提高欣赏水平,丰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认识;读诗可以提高人的伦理道德和文化素质,使之变得更加合群,更有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读诗可以疏郁泄闷,解胸中块垒,常读诗的人,对身旁的父母能够尽孝,对远处的国君能够尽忠,知识面也更加宽广。

在这里,孔子以“兴、观、群、怨”四个字高度概括了诗的社会教育功能,极为精辟。从研究阅读疗法的视角看,孔子的“兴、观、群、怨”论也是从社会和伦理的角度解释阅读疗法的作用机制,称得上是中国阅读疗法发展史上的理论先声。因为大凡心理上的疾病多是由于悲观、愚昧、自私、自闭、钻牛角尖等性格和精神上的缺陷所造成的,要治疗之,无非就是帮

助患者迷途知返,走出自我,融入社会。事实上,不只是诗歌具有这四项功能,兴盛于孔子之后的小说、散文等各体文献也都具备,只不过作用大小有所差别而已。

孔子其他的一些行为、事迹和言论,以今天的眼光看,对阅读疗法也不无启发。如孔子一生热爱学习、嗜好读书,他在63岁时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云尔”^[12]。这分明是在肯定读书乃长寿之法、却老良方,其理由是读书可以使人深迷于精神世界,心灵充实,快乐得不知忧愁。

孔子一生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怀才不遇,经常处于潦倒落魄的境地,以致部分弟子不免心理失衡,例如他的高足子夏就不禁感慨道:“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13]孔子的高明就在于谆谆善诱,能够点拨上三言两语,便把弟子们的心态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例如,他说自从在齐国听完《韶》乐后只觉得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这是引导弟子们多接触音乐,以音乐排遣生活的单调。在论及士的成长时,他说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4],又说士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5]。他曾让弟子们畅谈生活理想,曾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七八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这种生活方式大为赞赏,说“吾与点也”^[16]。孔子还教导弟子养成乐学、乐群、乐自然、乐清贫的态度,在他的《论语》中有不下40处提到“乐”字,其中包含快乐含义的不下15处。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7]这是宣扬求知之乐、友谊之乐;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8]这是提倡事业之乐;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9]这是阐发审美之乐;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20]这是肯定知足之乐,在孔子看来,快乐处处皆有、时时可得。孔子的这些教诲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可以说都是精彩的心里指导,表现出了高超的心理调节技巧。孔子教育弟子在修身之外要“游于艺”、乐自然,这是要求弟子们在业余要多接触音乐、书籍、舞蹈、山水,用艺术疗法或者说是审美疗法对自己进行全面保健;孔子暗示弟子们多听像《韶》那样好的音乐,这是对音乐疗法的肯定;孔子引导弟子们养成好学、乐学的态度,这是对阅读疗法的倡导。

先秦诸子中,孟子的《尽心》、庄子的《养生主》也都间接地肯定了阅读疗法的作用。尤其是庄子的“知人论世”和“得意忘言”思想对于阅读疗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与现代西方的某些阅读疗法理论不谋

而合,是中国阅读疗法史上宝贵的理论资源。“知人论世”就是要求读者在阅读读书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作者的心路历程和生活经历,要把自己想象成作者,回到作者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认真体会作者所写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意思和感受,这实际是把作者当作知音甚至自身,与其作心灵的全面沟通,歌哭相偕,情感共振,从对方那里汲取精神和道德力量,同时也让自己孤独苦闷的心灵得到宣泄和寄托。阅读过程中的这种心理活动机制,在现代西方阅读疗法理论中被称为“共鸣”。国外针对老年人施行的“传记疗法”,可以说是对“知人论世”思想的典型应用。

“得意忘言”是指在阅读时,要把语言文字看作是古人留下的糟粕,要认识到隐藏在语言文字之后的才是对客观世界的细致体验,才是事物的本质。把文献读透之后,得到了“意”,也就是“道”,语言文字自然就变得毫无价值,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庄子所说的“得意”之途,并不仅仅靠忘言,而是辅之以“心斋”、“坐忘”等体道方式,“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21],不但忘记肉身,忘记生死,而且忘记整个世界,更不用说忘记病痛了。庄子通过很多例子来阐述他所追求的“忘”这种精神境界,为了清楚、形象地说明“得意忘言”,他拿“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作比喻。他还说,忘记了脚,就是鞋子最舒服的时候,忘记了腰,就是腰带最舒服的时候,忘记了水,就是最会游泳的时候^[22]。我们根据庄子的思路推论,忘记了病,也就是身体健康的时候。为了达到“得意忘言”,这种摆脱束缚,游乎天地,精神臻于绝对自由的境界,很多读者都把读书作为突破现实困扰而获取心灵自由的手段,他们通过阅读活动努力领悟万物存在的意义和运行的规律,从而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对“得意忘言”的追求,落实到具体阅读某一本书时,就是讲求“会意”、“会心”,以求透过语言文字领悟更多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味外之旨”,淡化读书的功利目的,而将其作为单纯的审美行为和慰藉心灵的方式。庄子的“得意忘言”思想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阅读疗法的作用机制,现代西方阅读疗法理论把这种作用机制称为“领悟”。

到了汉代,人们对阅读功能的认识更加深入,出现了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与阅读疗法有关的观念和思想。

中国医学的源头《黄帝内经》,大约从战国时期开始编纂,经较多的医家于不同时期逐渐积累,到西汉时期已形成完整著作,全书共18卷,其中9卷名为《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

医学成就。该书非常强调精神与社会因素对人体及疾病的影响,其中就有“聚精会神是养生大法”之说。此说肯定了阅读等聚精会神活动的保健作用,在养生学上给予其很高的地位,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何以聚精会神?参禅、打坐、气功等固然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但更适用于生活恬淡的古人,对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人来说则显得有点奢侈,那么有没有既不影响事功,又能聚神养气的方法呢?阅读和练习书法不失为静养身体和自我提高两不误的好方式,非常适合于现代人。“聚精会神是养生大法”之说启示我们,尤其是患者和老年人,认真阅读就是养生大法,可行又自在,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寻找种种打着“大法”旗号的健身术,以免误入欺世盗名者设下的圈套和陷阱。

西汉学者、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奠基人刘向在《说苑》中一语点破阅读的治疗性质,破天荒将书和药这两种似乎不相干的东西直接联系起来,尝言:“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这既是比喻,也是事实。读书多了,知识丰富,心智得到启蒙和培育,愚昧的观念被逐一克服,境界自高,凡事看得远,想得开,心胸宽阔,不患得患失,自然能化解各种忧愁思绪,保持健康乐观的心境,从而收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效果。

汉代的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相适应,人们对文学的抒情功能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25]王符在《潜夫论·务本篇》说:“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24]司马迁发现了古代经典作家为什么写作的奥秘,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25]

班固、王符、司马迁把作家写作的动机归结为泄哀乐、发幽愤,言出有据,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作家的确是靠写作才得以保持精神健康,度过了人生的灰暗时期。司马迁认识到了这一点,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当他被处以宫刑,在身心两方面都遭受巨大摧残的时候,毅然选择了以撰写《史记》来照亮生命,

(下转59页)

双方对“图书馆是否可以经营”进行辩论,正方代表认为:目前,图书馆生存困难,应该进行经营,改善图书馆的条件,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反方代表认为:从图书馆公益事业单位的性质看,图书馆不应提倡经营,经营的提法只会缩减对图书馆的投入,加重读者的负担。

这次会议由于平等的会风,青年代表锐气十足,体现了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而与会专家所表现的谦逊、平和、睿智、包容的学养和风度,给代表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也正因如此,会议时而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悦耳,时而银瓶乍破,思想交锋激烈。在大会闭幕会上,汤更生秘书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称赞这次会议是一次平等、民主、务实、富有朝气的学术会议,同时也对青年代表提出了希望。代表们一致认为在这次会议上收获颇丰,通过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交流,他们接触到了一些新视角、新理念、新领域和新方法,这也是会议筹备者与参与者共同创造、良性互动的结果。

Summary of the Second Youth Academic Forum of China Societ for Library Science

Zou Xuming (Hunan Libra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second youth academic forum of China Society for Library Science in Shaoxing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作者简介〕 邹序明,男,1967年生,本科,副研究员,现在湖南图书馆工作。

(上接43页)

果然成功地做到了意志不倒、精神不垮,创造了写作疗法的奇迹。由写作疗法孕育的图书到了读者那里就成了适用于阅读自疗的药物,读者尤其是与作者的处境比较接近,与作者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读者,阅读作者的作品实际上是在重复作者的自疗过程。一般情况下,阅读疗法通常没有写作疗法的疗效大,但两者是成正比的,所谓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越是感情充沛,在创作过程中对作者本人具有强大自疗作用的书,才有可能对读者产生疗效,《史记》和后世的《红楼梦》都是典型的例子,它们不仅是作者自己泄哀发愤的良药,也是无数读书人的病中之宝。《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属于具有文学色彩的史书,而不是正宗的文学作品,它不同凡响的治疗作用表明,在文学之外,其他类型、题材的文献也有疗病的功效。

关于写作的抒情功能,西汉文学家扬雄概括得非常干脆、简炼,他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26]在这里,“书”还不是“书籍”的意思,而是“书

写、写作”的意思,扬雄认为创作就是抒发心声,可以表达和宣泄内心被压抑的情绪,达到精神满足和解脱的目的。而我们知道,写作和阅读犹如春种秋收,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写作的抒发作用同样也体现在阅读过程中。阅读的过程一是借作者之笔抒发自己的心声,享受到宣泄的快感;二是把作者的心声还原,体味作者创作时的心态和所处的环境,吸收一些新鲜的感受,像作者那样端正心态、战胜困苦。读者阅读中发生的心理调节作用在个别情况下比作者创作时所感受到的甚至更大。南北朝时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引用了扬雄上面那句话后,紧接着说:“故书者,舒也。”^[27]刘勰巧妙地利用“书”、“舒”二字的谐音,将扬雄的思想阐发得更加清楚。如果把这里的“书”解释为“书籍”,认为书就是抒发情感,给人带来舒心、舒畅、舒服的精神载体,也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

以上先贤的论述表明,中国人对创作和阅读的精神调节作用的认识差不多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深化。(待续)

The Thoughts and Cases of Reading Therapy from Pre- Qin Dynasty to Han Dynasty of China

Wang Bo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thoughts and cases of reading therapy from Pre- Qin Dynasty to Han Dynasty of China are dug over, and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reading therapy in this period is revealed.

〔作者简介〕 王波,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